

DAHOUFANG KANGZHANWENXUE DE
NONGCUN SHUXIE

大后方抗战文学的 农村书写

主 编 靳明全

副主编 刘 云 黄健平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大后方抗战文学的 农村书写

DAHOUFANG KANGZHANWENXUE DE
NONGCUN SHUXIE

主 编 靳明全

副主编 刘 云 黄健平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 / 靳明全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1
ISBN 978-7-80752-966-8

I. ①大… II. ①靳… III. ①农村—抗战文艺
研究—中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2132 号

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

主 编 靳明全 副主编 刘 云 黄健平

责任编辑 陈 红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 行 科 电话: (028) 86259422
总 编 室 电话: (028) 86259397
编 辑 部 电话: (028) 86259418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9.3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966-8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 86106170

前 言

本书所指的大后方是一个兼具空间时间意义的词汇。战事进展，使作为空间的大后方处于变动之中。华北七·七事变肇始，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中国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很多地区可为抗战大后方。武汉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后，在抗战第二阶段很长时期的战争相持中，中国西南、西北很多地区为抗战大后方。本书的大后方主要指第二阶段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以重庆陪都为中心的西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正是以这些地区的抗战作家所描写的农村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可称为解放区。本书也将解放区的部分抗战作品作为考察对象。

大后方抗战文学是表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具有浓厚民族解放色彩的文学。本书之所以将这些文学中的“农村书写”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过程中，大后方的农村以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支撑战争的兵源主要出自大后方的农村，正是如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才能抵御住日军的攻势，并不断展开反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有效地展开游击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的军事基



地、国防工程、军事要道的民工几乎全由大后方的农民承担。大后方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同仇敌忾，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除了勇于出征、乐于派工外，在天灾人祸面前，辛勤耕作，为抗日军队和政府纳粮、献粮、借粮、卖粮，支撑起了抗战的后勤供给，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其次，承担起了战争下的迁移苦难。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运动。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人口被迫向大后方内迁。东部的许多人口纷纷离乡背井，流入西部农村。在战争的推移下，大后方城市的大量人口也流入了农村。这种特殊的人口迁徙，对大后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外来人口和现代思想冲击着大后方农村，使大后方农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生了变化，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也就透视出了中国农村社会向现代性转换的沉重步伐，也为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向现代性转换为何如此地艰难提供了个案。

第三，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农村书写具有中华民族的悲剧色彩。众所周知，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民族矛盾，社会生活的轴心为民族解放战争，各党派及各社会团体一切活动，无不围绕此轴心展开。因此，民族解放意识，成为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凝聚力、向心力的支撑点。抗战文学的核心及基调亦如此。在民族解放意识下，大后方的作家拿起手中的笔，及时书写出民族意识浸润下的农村，赋予中国农村社会审美色彩。在这些抗战作家笔下，中国农村遭遇战事的衰败及衰败下的不断复兴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展示，令人震惊，使人激奋。中国农村的这种变化正蕴含着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抗争精神和悲剧因素。大

后方抗战文学或抒写高昂的民族解放激情，或描写英雄壮举的悲壮场面，或揭示社会阴暗，痛斥弊端，或反思中国国民性，发掘民族精神等等，无不包含着抗战文人满腔的热血，这也是大后方抗战文学能唤起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审美效应的重要原因。

本书各章节分别运用了不同的批评范式和方法，对大后方抗战文学农村书写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阐释，其论述内容可归类于以下三方面：

（一）宏观把握农村书写。《大后方抗战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阵线的一支重要部队，它在文化战线上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抗战文学中描写农村妇女形象的作品是不胜枚举的。通过具体分析，大后方抗战小说从农村妇女受压迫、农村妇女的启蒙、农村妇女出走的三个方面，揭示了农村妇女的命运。《三四十年代乡村小说创作实践的转变》重点选取中国三四十年代乡村小说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和阐释，纵向比较和分析了三个紧密相连时期——抗战前、抗战时期、抗战后——乡村小说创作的异同及发展趋势，概括和介绍三个不同时期乡村小说创作实践上的艺术特征和叙事风格。

（二）抗战作家的创作探讨。《论艾芜抗战长篇小说的多重意蕴及其矛盾性》论述了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各社会阶层、各政治团体呈现出了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大众的情绪随着战事的演进，兴奋与失望交替往复。即便同为出于抗战的目的，深层心理和动机也不尽相同，呈现出的是多样化状态。各文学团体对于当时文学任务的主张也各异其趣，对于文学是“大众化”还是“化大众”，是坚守文学的独立性还是



变文学为政治的工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这种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无疑是艾芜小说呈现出矛盾性特质的重要因素。《吴组缃大后方农村写作的艺术特色——以〈山洪〉为例》论证吴组缃用严肃的眼光审视和重现生活本质，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的破败过程。《山洪》作者深刻反映了皖南山区的真实生活，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把现实性和象征性巧妙结合起来，赋予小说本身和描写内容的真实性和普遍意义，提高了作品层次，升华了战争中萌发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主题。《沈从文自身以及笔下大后方“乡村人”的抗战》认为，沈从文抗战八年在大后方农村为民族抗战而创作。他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冷静地思考，顺应历史情境的变化，在保持作家本色和人生原则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大后方的抗战，以一个文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贴近普通民众生活，感受他们的心声，即使国家在物质匮乏的时候依然精神昂扬，为全民族抗战大后方的安定团结作了最大的努力。《抗战时期王西彦乡土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从语言特色、人物形象塑造、小说结构及现实主义特色等方面探讨王西彦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内部与外部分析形成这种艺术特色的原因，对于了解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变化，发掘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特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论端木蕻良抗战小说中的关东文化及反抗者形象》谈及端木蕻良的抗战小说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意识。深受关东文化影响，端木蕻良对萨满教文化持有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倾向，既肯定它的好，又否定其不合时宜的一面。在民族危亡的抗战背景下，他刻画了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以及东北善恶并存的胡匪世界，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抗战主义写实精神和充满野性的地方风格，在一系列抗战作品中着力塑造反抗英雄顽强拼搏的生命

斗争力、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强烈的求生意志，形成了小说独特的精神审美世界。《战时内迁贵州的难民生存状况探析——以蹇先艾战时作品人物为例》在叙述内迁贵州的难民人员组成情况的基础上，结合蹇先艾大量描述战时贵州人民及内迁贵州难民生活的作品，反映了战争对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同时这些作品人物也较为符合当时内迁难民的人员组成情况，对反映当时的内迁难民的生活状况很具代表性。

（三）抗战作品的阐释。《〈淘金记〉还原抗战背景下普遍的生活真实》分析了沙汀没有让战争掩盖其他所有的矛盾，而是将战争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淘金记》以一种疏离的态度对待战争，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在情节的构造上都十分真实。作品反映的是一些人性的本质以及看似具有戏剧性但确实是人生生活常态的情节，进而拨开了战争的迷雾，发掘出生活的真实性。《田涛抗战小说〈希望〉的伦理学阐释》从伦理学的角度入手，通过父子、母子、夫妻三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分析，揭示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内涵，表现出在新时期儒学式微后这样一套残缺的伦理体系对于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压抑。同时，《希望》具有隐含的政治指向，符合主流抗战文学对于小说的要求。何升云形象是抗战时期走出闭塞山村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典型。《〈山谷〉的空间叙事与文本分析》运用叙事学理论，立足于探讨空间问题在《山谷》中的表达，主要从叙事与文体的角度，分析文本的空间叙事与文体特征，以及其叙事魅力对读者产生的艺术效果。谈及故事空间在这篇诗化小说里的重要地位，并与文本的情调模式、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等都有着深层联系。由于隐含作者对社会大空间、生活小空间的高度把握，这篇大后方农村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情调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鲜明的个性化书写表达出



来。处于时空体中的山谷与城市构成文本张力，影响着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情节与结构。《从〈敌与友〉看老舍的创作特色及历史局限》将老舍为宣传抗战而作的短篇小说《敌与友》作为分析对象，论述了这部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展示在日寇侵犯国土全面抗战已经打响的情形下，落后偏僻、与世隔绝的山村里张村和李村世代为敌互不相容的恩怨。作品以犀利的语言风格、多元的创作倾向和历史地位与局限的适度刻画三方面见长。《分裂与整合——〈吕梁英雄传〉的人物形象塑造》认为扁形人物作为人物形象的一个类型，有着其存在的意义及对于文本的价值。文本中“他者”形象的分析，在“他者”与“自我”之间建立起一个对话的机制，于“他者”之中审视“自我”，于“自我”之中反观“他者”，以期实现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客观的交流得到充分的反映。《政治话语与乡土语言结合的典范——〈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抗战书写》分析了《新儿女英雄传》的文本特征，认为《新儿女英雄传》作为一部抗战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是伟大时代下产生的成功作品，确立了新英雄传奇叙事的基本模式。作者将冀中平原上的平凡儿女塑造成了集体的英雄，以朴实自然的大众语言，精心描绘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成长起来的英雄群像。作品时间跨度大，叙事朴素生动，深受读者喜爱，是实践《讲话》精神和发挥乡土书写的成功之作。

本书作为一种尝试性努力，意欲另辟蹊径，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作出新思考，肤浅和偏颇之处也难免，这尚待大家的匡正了。

目 录

前 言	新明全 (1)
第一章 论艾芜抗战长篇小说的多重意蕴及其矛盾性	(1)
第二章 《淘金记》还原抗战背景下普遍的生活真实	(18)
第三章 吴组缃大后方农村写作的艺术特色 ——以《山洪》为例	(33)
第四章 分裂与整合——《吕梁英雄传》的 人物形象塑造	(51)
第五章 沈从文自身以及笔下大后方“乡村人” 的抗战	(73)
第六章 田涛抗战小说《希望》的伦理学阐释	(94)
第七章 《山谷》的空间叙事与文本分析	(116)
第八章 论端木蕻良抗战小说中的关东文化 及反抗者形象	(130)
第九章 大后方抗战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	(150)
第十章 从《敌与友》看老舍的创作特色及历史局限	(166)
第十一章 抗战时期王西彦乡土小说的艺术特色	(181)



第十二章	三四十年代乡村小说创作实践的转变·····	(203)
第十三章	战时内迁贵州的难民生存状况探析 ——以蹇先艾战时作品人物为例·····	(228)
第十四章	政治话语与乡土语言结合的典范 ——《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抗战书写·····	(254)
参考资料	·····	(280)
后 记	·····	(286)

第一章 论艾芜抗战长篇小说的多重意蕴及其矛盾性

艾芜的小说《落花时节》（《丰饶的原野》第二部）、《故乡》和《山野》创作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这些作品中，以文学为武器，歌颂人民对一切黑暗势力的反抗是作者的总态度和作者主体性的总特征。但其时正是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各社会阶层、各政治团体都呈现出了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抗战，还有的企图在战争中大捞一把，也有的仅仅希求偏安一隅、及时行乐以打发空虚无聊的日子，慰藉空虚的心灵。大众的情绪随着战事的演进，兴奋与失望交替往复。即便同为出于抗战的目的，深层心理和动机也不尽相同，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各文学团体对于当时文学任务的主张也各异其趣，对于文学是“大众化”还是“化大众”，是坚守文学的独立性，还是变文学为政治的工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这种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无疑是艾芜小说呈现出矛盾性特质的一个客观因素。

—

《丰饶的原野》是艾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于 1937 年写出



了第一部《春天》，在1945年写出了第二部《落花时节》，又在1979年续写了第三部《山中历险记》。如果将三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小说的主题通过刘老九、邵安娃、赵长生以及锯子的遭遇，控诉压迫贫苦人民的黑暗旧社会。但是细读之下，尤其是第一部《春天》和第二部《落花时节》，会发现小说在统一的显在主题下潜伏了错杂不一的裂隙，存在着诸多矛盾。这种矛盾性乃是政治话语和以文学为本位分别影响和作用于作者的结果。

将《春天》和《落花时节》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整体来看的话，其中的矛盾性就特别明显和不容忽视。在《〈春天〉改版后记》中，艾芜写道：“……但对故乡的思念，却没有静息下了。于是，便决定把那位在岷沱流域的景色人物，移到纸上，也宛如自己真的回到故乡去了一般。”^①“作了《春天》五年后的今天，重新翻来读的时候，儿时亲切过的景物，又一度现在眼前了。我感到，我读这部《春天》一次，很像重归故乡一次似的喜悦。”^②可以说，这篇后记的情感基调和《春天》里的情感基调是基本一致的，充满细腻、质朴而又深沉的怀乡色彩。在《春天》中，艾芜就如在叙写家常。小说每一章都有大段的对故乡风貌的描写，艾芜常常忍不住细数农活的工序。小说展现最多的也是几个主要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劳动：走路、挖泥、吵骂打诨，而并非其深层的心理与动机。农民的面貌、土地的经验都被鲜活的方言土语完美地再现出来了。

在《春天》中，当然也存在雇农、富农、地主、土豪劣绅等

① 艾芜：《〈春天〉改版后记》，《艾芜文集》第六卷《丰饶的原野》，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同上。

阶级成分的划分，但在“精神还乡”的情绪之下，他们的阶级面目反而模糊、淡化了。在《〈春天〉改版后记》中，艾芜谈到他对《春天》人物的塑造：“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写到的时候，差不多都有一个熟悉的影子，显在我的眼前。尤其是邵安娃同他认识最久，……我对他印象太深了，他的名字和他的样子，他的性情，几乎都连在一道，仿佛另换一个名字，就会分散他的印象似的。”^①可见，艾芜是怀着无比亲切的情感叙写其笔下的人物的。因为情感距离的过于贴近，导致他只顾与这些人物做亲切地晤面，而几乎忘却了对其进行心理分析和社会解剖。如对地主汪二爷的描写，并没有写太多这个地主阶级成分所应负有的阶级色彩。小说一开头，写汪二爷的出场：“黑缎面子已经发黄的马褂，边沿上露出脏污的羊毛，就在他那扣纽子的胖手上，翻动着。蓝布长袍，是去年冬天新做的，但左边吊摆上，却有了一大片油渍。”^②他衣着邋遢，因为太过于肥胖，一边吃力地扣着钮扣，一边给雇农分派当天的工作，而雇农们却只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对他的吩咐爱理不理。“汪二爷有些恼怒，但要责备他一下，又觉得道理似乎并不在自己这边，只好伸起手指，朝头发里戳着——红结子，油腻乌光的缎瓜皮帽，便随手偏在一边了——然后这么说道：‘淘堰……这样早就去么？’声音虽是严厉得很，但也不一定要强迫他们。”^③这样的描写和文学作品中一贯阶级色彩鲜明的地主形象有一定的出入，甚至让读者觉得这个地主原来也并不怎么坏，这副笨拙、恼怒、理屈后还强逞一句的样子至多是

① 艾芜：《〈春天〉改版后记》，《艾芜文集》第六卷《丰饶的原野》，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同上，第5页。

③ 同上，第5页。



滑稽可笑而已。

当然《春天》，也不是单纯的“乡土回忆”，社会分析这一重大的主题一直都暗藏于其中，努力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是，诗化的乡村图景在《春天》中被反复地描述，已俨然成为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只因文中的乡土的气息如此浓郁，怀旧的情感如此深沉、热烈，以至于这种“诗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凌驾在小说的显在主题之上，和小说的显在主题分庭抗礼，造成小说结构上的对位性。比如，作者对故乡风物的过分沉醉冲淡了小说反映社会悲剧的力度；作者充满善意的叙述常常有模糊人物性格之嫌；小说中因再现了太多回忆中的亲切景象，以致削弱了对现实的沉痛感受。而《丰饶的原野》又并非一次简单的“精神还乡”。相反，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意图成就为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小说，而不是充满温情的拉家常游戏。

在艾芜的《〈春天〉改版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作品中，就渐渐感到我不是替这三个熟人，记他们的生活言行，而是把我们五千年以农立国的奠基石——最劳苦的农民，拿来一刀一刀的解剖，分析。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看出了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看出了反抗和服从的二重性格。”^①这段话显示出，艾芜最明确的创作理念是以故乡为对象作一次社会分析和国民性解剖的实验。也正因为这个创作理念，作于1945年的《落花时节》，虽然其中也有故乡的风物在处处撩拨着作者和读者的心绪，但更为迫切的却是时代主题的催促。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笔下关于故乡温暖的记忆和朦胧的意

① 艾芜：《〈春天〉改版后记》，《艾芜文集》第六卷《丰饶的原野》，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趣成为次要，人物陡然变得性格分明和典型化起来，同时也更加简单和单薄。于是，我们看到，原本在《春天》中至多还只能算是个喜欢耍些滑头、拈轻怕重的赵长生，在《落花时节》中一变成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而《春天》中那个老实、厚道、稳重至多是有些犟脾气的好庄家把式刘老九，在《落花时节》中俨然成长为觉悟了的反抗者；作者更是在邵安娃身上，勉力作着阶级文章，为突出邵安娃的“奴性”和汪二爷、冯七爷的凶恶面目，原本可以不死的邵安娃，被作者匆匆地从日常生活中连根拔起，抛入了一场因过于传奇也因此过于简单得而让人无法信服的悲剧结局；先前阶级色彩还比较淡弱的汪二爷、冯七爷，也都在邵安娃之死的前因后果中变得穷凶极恶，至此，阶级矛盾无比激化。在《落花时节》中，先前令人陶醉的散淡从容的节奏戛然而止，人物与情节都迅猛地朝向一个明确的主题与意义奔赴过去。于此，《丰饶的原野》终于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社会分析小说。

二

如果说，《丰饶的原野》中的矛盾性起源于各部成书的时间相隔较久，作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呈现出思想和情感的不同状态，那么，作于同一时期的《故乡》中的重重矛盾就是在同一时段内历史传统和时代现状的合力对作者内心影响的显著体现。《故乡》是一部以抗战为语境的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作者并未将视线转向中日战争的具体场景，而是将叙述的重点放在爱国热血青年余峻廷从上海回到故乡的二十多天里的见闻和经历上。在《故乡》的文本具体展开中，作者一度退出传统的权威地位，不再高居主人公之上，而是对主人公采取对话方式。在作品



中，余峻廷、徐松一、廖进伯等人的自我意识以及人物之间意识进行交锋。作者仅是对话的组织者、参与者。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自我意识自由展现，作者似乎无意去对人物进行道德评判，而是通过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使其自行进行评价。主人公自我意识具有独立性、对话性、未完成性、未论定性；作者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这就使得小说带上强烈的矛盾色彩。

在《故乡》中交织着对乡村社会的批判与讴歌的双重纠结。《故乡》小说主人公余峻廷的身份具有“乡村游子”的背景。他曾经是乡村中的一员，但反观故土时又都脱离了乡村人的身份，在文化和心理上都明确地居于乡村之上。他因此得以借助与乡村若即若离、蕴涵着内在悖反精神的游子姿态，成为乡村和乡人的讲述者。这一身份使讲述者常常在讲述中不可避免地倾注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又处于以批判为基本的创作理念统摄之下。于是，这就使《故乡》的文本形态呈现出抒情和批评的复杂交织，充满着自我的张力。《故乡》常常在故事进展过程中插入大量对故乡自然风貌、地方风俗、乡人们的生活经验的描写。例如小说开篇对故乡的田园牧歌般的描写：“碧绿的茶树，把满山满岭装饰起银白的花朵，敞在暖和阳光的天底下，闪烁出无数小星似的光辉。这是故乡！赤褐色的泥土，点缀起棵棵青松，森严静寂的林 中，时时有鸟鸣的声音，播送出来。这是故乡！人人家屋前的枫树腰身上，缠着臃肿的稻草，水牛黄牛躺在下面休息，它们都半闭着眼睛，宁静地嚼着胃里翻出的干草。这是故乡！村巷里乱堆起棕黄的牛粪，屋角上冒出松柴气味的火烟。生了蛋的母鸡，则